

章太炎超人哲学的逻辑结构与思想脉络

谢牧夫

内容提要 章太炎除了主张文化复古的齐物哲学,还主张激进革命的“超人超国”学说。其超人哲学涉及《独居记》《建立宗教论》《五无论》三篇核心文本,分别阐发从小群脱序向大群接序的机制、佛教救世道德、儒家社会主义平等观三项要素以及反传统的革命者、修行无生主义的超越者、克里斯玛领袖三重超人身份。在更宏大的思想史背景中,超人哲学揭示三个问题:一是社会运动的领导者是克里斯玛型超人,二是社会运动的根本原因是“匮乏”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三是社会运动的终极目标是作为思想实验的革命乌托邦,而革命乌托邦之所以不能实现是因为社会秩序与动力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 超人哲学 儒家社会主义 克里斯玛 革命乌托邦

谢牧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200241

高瑞泉先生在《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想研究》中将章太炎视为中国近代唯意志论哲学的代表之一,而当代对章太炎哲学解释最流行的模式是“齐物哲学”。将齐物哲学看作章太炎全部哲学的主体是一种后设的、试图对章太炎哲学整体进行重构的解释模式^[1],但这一文化复古主义的主张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唯意志论的成分。齐物哲学是否足以概括章太炎哲学的主要内容?章太炎思想中唯意志论的部分与齐物哲学是何关系?章太炎唯意志论有何特殊之处?

日本学者西顺藏在《从无而来的形成——关于〈我们中国人民〉的成立》一文中将章太炎思想解释为“人民主义”,认为其《五无论》是一种“无限革命的理论”;近藤邦康的《章炳麟革命思想之形成——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也接续了西顺藏对章太炎思想的总体判断^[2]。王远义将章太炎这一部分思想

[1]对齐物哲学的研究和解释,可参见汪晖、汪荣祖、小林武、慕维仁等学者的著述。

[2]西顺藏观点参见刘国平的转述,见刘国平:《日本的章太炎·鲁迅研究论稿》,〔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1页。近藤邦康的论文见其《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总体来看,西顺藏和近藤邦康对章太炎哲学的解释模式对于大陆学界章太炎研究影响不大,似乎只有台湾学者王远义《宇宙革命论:试论章太炎、毛泽东、朱谦之和马克思四人的历史与政治思想》一文观点与两位日本学者不谋而合,此文载许纪霖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称为“宇宙革命论”。这几种说法的内核是相似的,都是把章太炎思想与其后的毛泽东、朱谦之思想进行比较,认为这是一种左翼的、人民主义立场的、主张激进社会变革的革命浪漫主义思想。

从解释模式上来说,这种解释与齐物哲学解释完全不同,双方从章太炎哲学文本中选取不同的部分,各自认为自己选择的内容反映了更本质的东西。齐物哲学解释涉及的主要文本是《俱分进化论》《四惑论》《齐物论释》这三篇,而章太炎自己称为“超人超国之学说”的“宇宙革命论”,除了涉及两篇无生主义的论文《建立宗教论》《五无论》外,还涉及他最早的论文《独居记》。

分析文本之前,先要对“超人哲学”进行释名。章太炎大约在三处提到他与尼采、超人之间的关联。一是《五无论》中认为激进的社会变革以无生为最高目标,所以需要“大士超人”来领导。“是故一二大士超人者出,诲之以断人道而绝其孳乳,教之以证无我而尽其缘生。”^[1]二是超人具有“依自不依他”的特质,这一特质与尼采、佛教相似。“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儒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橐,庶于中国前途有益。”^[2]三是这一部哲学整体被称为“超人超国”之学说^[3],是指在超人哲学的规划中,需要由少数克里斯玛式的超人领袖领导社会变革,最终达到打破一切共同体、消除一切众生的宇宙涅槃境界。下文将基于《独居记》《建立宗教论》《五无论》等文献说明超人哲学的逻辑结构。

一、大独与群己关系的脱序

《独居记》是章太炎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其写作契机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章太炎对清政权感到失望。《独居记》以《后汉书》中的《独行传》为历史依据,属于章太炎所说三项国粹中的人物事迹类。《楹书》短序中章太炎自称“幼慕独行”,游侠与独行是章太炎少年时便崇敬的两类人格,之后便成为他儒侠、超人哲学最初的源头。

章太炎所借用的“独行”是一种特殊的历史人群。范晔《后汉书》中有一篇《独行传》,“独行”这一名称大体只见于从两汉到魏晋这一段历史,就史书的描述看,这类人有几个特点:一是他们身处国家政权较为衰弱或动荡的时期;二是他们不是游侠一类的武士,而是文士,一般都受过较好的儒家教育,但出身并不太高,或者不出仕,或者是基层的小官;三是在道德上,他们往往都是因忠孝节义而闻名^[4]。这一人群与帝国权力结构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第一,独行不是游侠这种帝国秩序的破坏者;第二,独行也不是法吏这种帝国秩序的基层触手;第三,独行是在帝国秩序之外,遵守儒家道德,维护民间自发秩序的人群,是帝国政权力量衰弱时,维护民间政治稳定的积极因素。

章太炎所称的“大独”与历史上的“独行”有同有异。《独居记》以独、群并举,又分为小独、大独和小群、大群。独指的是不从众从俗的个人。小独有三种,好勇斗狠的是“鸷夫”,自己贪敛而丝毫不愿助人的是“嗇夫”,独善其身的逸人隐士是“旷夫”,“三者皆似独,唯不能群,故靳与之独也”^[5],意思是这些人虽然不从众,但是他们的“独”无益于新的良性秩序的建立,并不是真的独,也无益于“群”。大独与小独的区别就是前者是有效秩序的建立者或维系者。

真正大独与庸众的关系,章太炎将其比之为日与五纬、海与江河。大独如果混迹于庸众之间,为

[1]章太炎:《五无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8页。

[2]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0页。

[3]章太炎:《与张季鸾》,《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6页。

[4]现有对“独行”的研究不是很多,此处主要参考杨颖:《〈后汉书·独行列传〉与正史中的〈游侠列传〉传统》,〔重庆〕《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张睿:《汉晋之际独行群体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5]章太炎:《独居记》,《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小群所束缚,则其才能将被埋没,成为庸众的一员。所以,“与群而成独,不如独而为群王。……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1]章太炎的意思是有能力的大独应从旧的秩序和小共同体中脱序出去,建立新的“大群”。

此后,《遁书》中《明独》《明群》等篇将这一思想的背景揭出。章太炎认为晚清的局面是:“天下多败群。……社庙未迁、官号未革、权概未变、节簿未毁;俎犹若俎、钲犹若钲、羽犹若羽、籥犹如籥、戚犹如戚;而文武解弛,举事丧实,禁掖持柄,无政若雨。是为大群之将涣。”^[2]原有的大群,即国家的统治已经难以维持,但社会的各个部分仍如僵尸一般维持运转,丝毫没有变革,这是一幅衰世的图景。指望国家自己变法已经不可能,旧的大群既已无望,希望何在呢?“窃闵夫志士之合而莫之为缀游也,其任侠者又吁群而失其人也,知不独行不足以树大旅。”^[3]唯有“独行”才能负担变法的大任,联系稍晚写的《变法箴言》就知道大独指的是来自原本的国家体制以外,且能够领导国家变法图强的人。

章太炎对独行的改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正史中独行是来自民间对于帝国秩序的自发维系者,章太炎将建立新群的希望寄托于“大独”,但新群必与作为旧群的清政权不同,此时章太炎对于改革是否要保留清政权的统治就是有疑虑的,这就与传统独行忠孝节义的道德不完全符合。另一方面,章太炎的大独是超人最初的原型,超人是不断破坏较小的共同体,而大独的作用在于他“能群”,这个“群”与梁启超的主张差不多,大体上就是军国民主义。

古代的中国社会虽然是中央集权,但治理能力有限,除国家之外有各种小共同体,比如家庭、宗族、乡里、党派、官僚系统等。在国家运转良好的情况下,各种小共同体是维系国家这个大共同体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当运转失灵却一时还未崩溃时,各种小共同体就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这是由任何制度都有维系自身存续的本能决定的。所以当大群失去自我更新能力的时候,变法者即“大独”要打破各种小群之间的界限,使得整个大群能够定于一,然后才有变法图强的可能。

《独居记》反映了章太炎早期思想的两重性,重新使大群定于一,这似乎还是走上王朝循环的老路,但是旧的朝代更替只是最高政权的更替,具体的中下层组织未必需要打破。章太炎当时还不懂现代政治学、社会学的知识,但已经隐隐意识到未来社会形态的变革需要打破旧式的各种小共同体,正是因为西潮冲击之下,他意识到未来的政体将与两千年的帝制不同。章太炎写下他这第一篇哲学论文时不过二十五岁,他失落地认为“吾流污于后世必矣”,但文中三个思想将影响他此后一生思想的发展:一是“大独-大群”这一结构,以及从小群中“脱序”,再与新的大群“接序”这一行为模式;二是推崇令出于一的中央集权;三是儒家社会主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

二、新道德的佛教化

超人哲学的第二部分是《建立宗教论》为中心的三篇论文,此时超人哲学由“独行”人格的儒家话语转变为佛教话语。对于为何要建立宗教哲学,章太炎自己解释道:“高尚者,在并人类众生而尽绝之,则思想之轮廓在是矣。然举其切近可行者,犹不得不退就民族主义”^[4]，“诚欲普渡众生,令一切得平等自由者,言无政府主义不如言无生主义也。转而向下为中国应急之方,言无政府主义不如言民族主义也。”^[5]这里意思很清楚,章太炎此时主张的民族主义和无生主义,分别对应儒侠哲学和超人哲学。民族主义用来推翻旧政权,对此无政府主义过于迂阔所以无用;无生主义用来建立平等自由之新

[1]章太炎:《独居记》,《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2][3]章太炎:《明独》,《章太炎全集:遁书初刻本、遁书重订本、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4页,第55页。

[4]章太炎:《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2页。

[5]章太炎:《排满平议》,《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9页。

政体并最终走向宇宙涅槃,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浅近而无用。更确切地说,与建立平等自由新政体对应的是超人哲学的第二部分,即《建立宗教论》中发明新道德的主张,而无生主义应当专指超人哲学第三部分《五无论》的宇宙涅槃论。

上文已述,章太炎超人哲学的第一个主题是在新旧、小大共同体之间的“脱序-接序”行为。第二个主题就是新道德的建立。他在《与伯中》中说:“共和政体,以道德为骨干,失道德则共和为亡国之阶,此孟德斯鸠所已言者。所谓道德,岂必备三德六行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不侮鳏寡,不畏强御,则足以为共和之本根矣。”^[1]新政体要求国民有足够的道德水平和自治能力,而新道德的内容又不能是“三德六行”的传统儒家道德。在儒侠哲学中,章太炎已经用《儒行》的刚毅道德和侠的敢死精神替换儒家的柔性血缘伦理;在超人哲学中,章太炎选择用佛教道德来替换儒家道德。二者的区别在于,儒侠的刚毅道德是通过推翻清朝而结束帝制时代,超人的佛教式新道德是呼唤众人走向五无世界的革命乌托邦。前者是告别历史,后者是走向未来。

对于如何选择建立新的价值观,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思想家认为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关联是结构性的,儒家的世界观既然被佛教和进化论所取代,那儒家的道德也不可。儒家的天理世界观符合古代中国仅将东亚世界看作天下的全部,东亚之外全以夷狄视之,离中国越远则文明程度越低的观点。这套价值系统已为晚清的几场战争所打破,但欧洲式的以西方为文明,西方以外为野蛮的狭隘文明观也不为中国思想家接受。中国思想家需要一个不中不西的方案,佛教就是较为趁手的选择。暂时使用佛教世界观确实在思想上和情感上都较容易被接受,比如谭嗣同引入“以太说”时便认为以太是“法界”的自体。而进化论则许诺了非中心文明也有可能达到更先进阶段。下文将分析指出,章太炎超人哲学的史观是以单线进步观为结构,填充的内容则是佛教与绝对平均主义,新道德需要有利于社会进步,其放弃儒家道德就是出于此原因。

儒家道德不利于今日的原因有二。一是儒家功名利禄之心较重。《答铁铮》中说:“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2]这是说在政治上,儒家士大夫倾向于与君主合作,不利于平等的政体。二是旧的柔性道德过时,无益于国民性,妨碍新道德的建立。《与梦庵》中说:“然则三纲六纪,无益于民德秋毫。使震旦齐民之道德不亡,人格尚在,不在老庄,则在释氏,其为益至远矣。”^[3]

相比儒家与基督教,佛教是不错的选择。在章太炎那里,唯识学的“依自不依他”、独行人格的“大独必群”、尼采的“超人”这三种气质被融合为一。他如此形容:“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儒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4]这里除了大独的气节外,只有加入佛教思想,视宇宙与众生为幻,才能“排除生死,旁若无人”。

晚清思想家借助佛教时都有强烈的人世取向,章太炎对佛教也加以了改造^[5]。在《独居记》中,章太炎先否定小独,再让大独从小群中脱序,最后完成大独建立大群这一目的,类似的论证模式也出现在《建立宗教论》和《人无我论》之中。《人无我论》证明遍计所执之我和依他起之我都非真我,只有二者断灭,圆成实之我才能显现。而真我又应“不执一己为我,而以众生为我”^[6]。这一区分,与区别小

[1]章太炎:《与伯中》,《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15页。

[2][4]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5页,第260页。

[3]章太炎:《与梦庵》,《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0页。

[5]关于晚清佛学,参见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21页。

[6]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37页。

独大独同构。消灭假我,明了以“自识”为宗之后,所谓轮回便是假我的轮回,佛教主张厌弃有情世间,将众生济度出三界之外。对于众生应当“夫依他固不可执,然非随顺依他,则无趋入圆成之路。……顺此依他,故一切以利益众生为念,其教以证得涅槃为的。”^[1]“不执众生而随顺众生,以脱离有情世间和脱离轮回为最终目的,这又与小共同体到大共同体的“脱序-接序”行为完全一致。而在超越层面对现世的否定则为《五无论》的宇宙涅槃论埋下伏笔。

超人哲学基于个体的“自尊其心”,并要求随顺、济度其他众生,教化者被称为“勇猛大心之士”或“大士超人”^[2]。当时所有的现代化方案都基于西方早期社会学的单线进化史观,章太炎对其隐隐不满,但在理论上尚不能与之抗衡,唯一能做的就是以佛教改造之。但以佛教改造单线进化观造成的问题就是空想的革命乌托邦的出现。超人哲学的初级目标是通过建立新道德来维系未来的共和政体,终极目标则是宇宙涅槃。但事实上二者并非单线关系,现实层面的目标仅到共和为止,涅槃仅仅是理想层面的目标,二者并非单线的远近关系。章太炎一边说“道德普及之世,即宗教消镕之世”^[3],一边又要大士超人帮助没有勇猛大心的普通人“随顺进化,渐令厌弃”,最终走向涅槃。这表明章太炎对于现实与理想两个层面的目标没有提供一个合适的图式安放,只能将其合并于单线进化史观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作为超人哲学的第二部分即《建立宗教论》,其精神是入世的,仅以建立能够适应和维护共和制的新道德为目标,其新道德内容是:“非以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4]，“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行治浮华心,以唯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5]。显然,新道德的内容虽然是佛教的,但还保留了儒家的人世精神,而并非是求解脱的。

章太炎的超人哲学中来自佛教、尼采的影响可以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在个人层面,佛教将儒侠式现世中除暴的不畏死提升为视宇宙为虚幻的超越性的不畏死,但反过来最终价值取向并非出世而是入世的。在国家社会层面,佛教因素的注入使得国家相对于众生、宇宙来说是小共同体,但也使得国家这一共同体的边界丧失了牢固性。在狭义上,尼采对于章太炎的意义并不很重要,仅仅是在描述佛教“依自不依他”精神时被拿来作为类比;但在广义上,章太炎思想中反传统和认为需要激进的社会变革这些方面,都与尼采哲学有着结构和宗旨上的相似性。

《建立宗教论》虽然以佛教话语改换了《独居记》的思想,但是二者结构基本相同,改变的重点在于新的世界观和道德都变为佛教化的:《独居记》要求冲破小群建立大群,《建立宗教论》则表明,人类也只是小群,人类之外还有众生和宇宙的大群。一旦将强烈的人世精神推广到人类之外,那超人哲学就将进入第三阶段。

三、五无世界:绝对平等主义的滑坡

《五无论》大概是中国近代哲学史上最雄奇而又难解的篇章之一,难解的原因在于其思想中诸构件不是显明的。我认为构筑宇宙涅槃论这一思想需要三个要素,《独居记》提供了小群大群之间“脱序-接序”的行为模式,《建立宗教论》提供了佛教化的宇宙观和入世精神,最后一个要素就是均贫富的绝对平均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在古代思想史上一直存在。在官方,其表现为加强国家控制下的阶级内部平等;在民间,其表现为农民起义时均田均产的思想。这两种思想在章太炎这里汇合了。

[1][3][4]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37页,第440页,第440页。

[2]章太炎:《俱分进化论》《五无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13、458页。

[5]章太炎:《与梦庵》,《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1页。

近代哲学中,平等是一项基本的价值诉求,很大程度上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谭嗣同《仁学》中的平等观是较为全面的,他要求破除五伦之中的四伦,这既是要瓦解作为政治等级基础的伦理秩序,也是要证成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非后来的阶级平等。在这点上章太炎显然对谭嗣同甚为不满,因为谭嗣同在《平等论》等文中认为父子、男女、君臣三种不平等关系本身合理,皆不可废^[1]。而章太炎所接受的平等观则是自古小农意识形态中均贫富的绝对平均主义。章太炎在许多论文中对于秦制废除封建贵族津津乐道,认为这是实现了中国式的平等,这种平等在未来建立共和制时应当保留。章太炎在《五无论》和《代议然否论》中对代议制的批评基本就是将代议制与封建贵族制进行类比,认为有诸多小团体的贵族制比大权独揽的君主专制破坏力更大^[2]。对此他设计了一些措施,“一曰:均配土地,使耕者不为佃奴;二曰,官立工厂,使佣人得分赢利;三曰,限制相续,使富厚不传子孙;四曰,公散议员,使政党不敢纳贿。斯四者行,则豪民庶几日微,为编户齐人得以平等,亦不得已而取之矣。”^[3]章太炎认为的平等就是对豪民、富户、商人的限制,因而这种平等本质是对财产权的限制。“限袭产之数,不使富者子孙躐前功以坐大也。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驱策者,不得有,山林场圃不自树艺者,不得有;盐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旷土不建筑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梟雄拥地以自殖也。”^[4]而同时章太炎又认为“法吏”天然是平等的维护者,任何社会上的不公或国家对国民的施暴都可以得到法吏的公正解决^[5]。章太炎的平等观要求抑制商业,推崇国家机器,打破阶级,这是小农平均主义、新法家和空想社会主义三者的结合。这种平等观认为不平等不是权力不公造成的,而是财富分配不均造成的,因此消除不平等的方式就是限制财产权并动员贫民反对豪民。在同时期的《民报》上,黄侃的《哀贫民》认为国家、地主都是对贫民的剥削者。“朝廷,盗藪也;富人,盗魁也。”^[6]刘师培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在《废兵废财论》《悲佃篇》中认为去除专制在于废除政府以及铲去地主、军人、商贾等阶级。“然处今之世,非复行井即足郅治也,必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斯能真合于至公。”^[7]

超人哲学虽为个体主义,但章太炎天然地将人分为两类,有勇猛大心者和无勇猛大心者,前者是平等观的规定者和执行者,后者是接受者。虽然前者有大独、大士超人等以变法、救世为目的的崇高人格,但章太炎只承认前者获得个体的地位,后者仍仅是大群的从属者,因而章太炎提倡的是有限的个人主义,他并未改变,甚至说他的学说可能加强了“一个权威垂直施与的平等”这一框架^[8]。

思想的诸要素具备,无生主义便水到渠成。前文已说,《独居记》是超人哲学的起点,内容是打破与大一统帝制耦合的诸多小共同体,释放个人使之融入未来的新国家。而《建立宗教论》延续小群、大群这一结构,将其扩大为一个从小到大的连锁序列:家庭、阶级、国家、一切制度、人类、众生(有情世间)、世界(器世间)。相邻的前一项都是包含在后一项之中的小群。破家之后是以均贫富破除阶级,建立共和,此是现实目标,之后还有理想层面的目标。“人类本平等,而所依之地本不平等;人类之财产可以相共而容,而地方之面积不能相共而容。……是故欲无政府,必无聚落。农为游农,工为游工,女为游女。苦寒地人与温润地人,每岁爰土易室而居,迭相迁移,庶不以执着而生陵夺。”^[9]这是为了维护

[1]章太炎:《平等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6页。

[2][4][5]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1-316页,第319页,第319页。

[3][9]章太炎:《五无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4页,第456-458页。

[6]黄侃:《哀贫民》,《黄季刚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54页。

[7]刘师培:《悲佃篇》,《刘师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

[8]高瑞泉:《平等观念史论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06页。

人类内部的绝对平等而打破小于人类的任何共同体,使得只存在原子式的个人。而即便如此还是不够,虽然人类的大恶都由政府和国家造成,但其原因在于人根性之恶,彻底断绝纷争和不平等的唯一方法是号召人类全部停止繁殖。更进一步,章太炎误解了唯识学,认为一切众生共用同一个阿赖耶识,人类虽灭只要还有众生在繁衍那人类迟早还会在轮回中出现,所以还须灭尽众生。最后根据进化论,即使一切生物消亡,只要宇宙世界还在,总有一天会有生命出现,所以最彻底的一步就是连宇宙一并进入涅槃。若将这一学说分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诸要素:超人本身就是对人类的超越,超人超国学说也是对人类物种和一切共同体的超越。章太炎将理想层面、现实层面以及佛教出世、儒家入世纳进同一个单线图式之中,转变为时间上的现在与未来,以及空间上小于国家的共同体和大于国家的共同体这两阶段,因而借用了佛教的世界观但完全保留儒家入世精神。以此为精神动力,以均贫富的绝对平均主义为核心观念,一次次从较小的群中脱序,建立或进入更大的群,而代价是每次上一个小群都要被弭平,这种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无限制滑坡的结局就是连至大无外的宇宙也一并消亡。最后,“结果他所达到的顶多只是批判的平等形而上学,而没有成立建设性的平等政治哲学”^[1]。

四、超人哲学的思想史结构

超人哲学如上文分析,本身包含清晰的逻辑结构。但同时,因为它三个部分的每一个都不只有单一的思想来源,所以将其放置到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则会呈现出与微观逻辑结构截然不同的宏观思想史结构,这也同样包含三个部分:一是作为社会运动领导者的超人,二是社会运动的根本原因是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即匮乏,三是社会运动的终极目标是作为思想实验的革命乌托邦。

“超人”在字面意思上就是对旧的人类、人格、人性的超越,因而作为与传统的圣人所不同的一种理想人格,“超人”一定不是旧秩序的维护者,而是思想与社会的变革者。因此,“超人”既不是如晚明哲学中的“豪杰”般的对旧制度的局部修正者,也不是谭嗣同式的“烈士”般的具体的实践者,具有“勇猛大心”的“大士超人”在章太炎这里本身就是包含了思想和实践各层面的全能主义变革者。分解来看,《独居记》描述了一个破除旧群、建立新群的革命者,《建立宗教论》描述了具有超越性道德的无生主义的修行证理者,《五无论》描述了具有超凡魅力的引导人走向革命乌托邦的克里斯玛式领袖。完整的超人就是这三者的合一。

超人哲学思想史结构的第二层是对匮乏社会的经济批判。章太炎作为一个儒家社会主义者,他本身有强烈的平均主义倾向。抑兼并、均贫富、重农抑商等思想或政策都属于儒家社会主义的传统,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接受西方社会主义时本身就具有的一些前见,这导致中西社会主义存在不同的特征或民族特色。章太炎在谈论中国古代制度的优点时说:“至于中国特别优长的事,欧美各国所万不能及的,就是均田一事,合于社会主义。……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的社会主义。那不好的,虽要改良;那好的,必定应该顶礼膜拜,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2]然而在古代,儒家式的社会主义、中央集权制、人均资源匮乏是在同一个系统中紧密关联的,三者是相互加强的关系。章太炎一贯支持秦制,所以他赞美匮乏而反对丰裕及商品经济,也是逻辑上必然的,这在多方面都可得到证实,比如他在《革命道德说》中将人分为十六等,以政治、经济地位最低,受教育水平最低的农人为道德最高的一等,相反,知识越多、经济条件越好的,则道德水平越差^[3]。在《五无论》和《代议然否论》

[1]高瑞泉:《平等观念史论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页。

[2]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1页。

[3]章太炎:《革命道德说》,《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页。

中,需要被限制权力的对象不是官府而是富户豪民,其措施一方面继承古代均田、抑兼并的传统,另一方面吸收社会主义的限制商品经济和个人财产等主张^[1]。这里章太炎的主张可以直白地表述为:平等是一种好的价值,但实现平等的必要代价或措施是抑制乃至消除富裕阶级。《四惑论》更是主张吃饱穿暖以外任何更多的物质享受都是不正当的^[2]。直观地看,在前现代社会,由于基于个人权利的平等尚未建立,匮乏和平等是一对双生子:越是在较为富裕的阶层,各种政治经济关系就越多元化;只有在较为贫困的阶层,才能实现阶层内的大致平等。

章太炎的儒家社会主义至少有两个不足。一是对于匮乏的产生原因分析不明。这里至少包含三重矛盾,由重至轻分别是人口增加与土地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国家权力对民间财富汲取产生的矛盾、地主与佃农的矛盾。在每个朝代面临危机而农民不堪重负时,国家权力对他们的汲取都大于地主对他们的剥削^[3]。章太炎忽略了其他两个更重大的问题而认为贫民与豪民的贫富之别是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来源,这种归因是很片面的。二是宋代以后随着大量过剩人口的产生,土地总体上越来越分散到中小地主手中,大地主逐步消失,但随之而来的是人地比率的恶化和所有人普遍趋于贫穷^[4]。也就是说随着过剩人口上升,人们趋于匮乏、贫穷是必然发生的普遍现象,与地主对佃农的压迫程度无关。如果像章太炎理想中那样,豪民地主完全消失,所有人成为自耕农,平均倒是平均了,但恐怕人口也已经达到饱和,整个社会将趋于极致的匮乏。在这种情形下,“不患寡而患不均”还能算一个崇高的理想吗?

第三层是宇宙涅槃作为革命乌托邦式的思想实验。章太炎的《五无论》与康有为、谭嗣同、邹容等人的革命乌托邦不同,事实上仅是一个带有革命乌托邦形式的思想实验。第一,章太炎超人哲学的固有要件是上文所分析的逻辑结构三要素,他说:“若自明者观之,序次秩然,推行不乱,孰后孰急,若指果于掌中。”^[5]这里意思是终极虚无的五无世界是这三要素自组织的结果,并不真的是他的最高理想。因而《五无论》完全不像一般的革命乌托邦那样崇高辉煌,而是悲壮惨烈的。第二,超人哲学在要建立新的大群的前提下,同时要瓦解旧群的一切等级依附关系,这需要来自下层的、人民主义的、由克里斯玛领袖领导的群众运动。但在将绝对平等主义作为根本观念和诉求的情况下,任何稳定的秩序都将无法建立,结果是使得从小至大的群一个个被弭平。这就是超人哲学给出的结论:对于大型的匮乏社会,任何进步的力量必然破坏原有的维系社会的力量,不论后者是否合理,而进步力量本身又不足以提供新的维系能力。秩序与动力的矛盾就是超人哲学中革命乌托邦这一思想实验提供的最终启示。

[责任编辑:洪 峰]

[1]章太炎:《代议然否论》《五无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9、454页。

[2]章太炎:《四惑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81页。

[3]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传统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4]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321页。

[5]章太炎:《五无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9页。